

教

育

略论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

陈育辛

今年十月十八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诞辰九十周年。

陶行知先生的一生跨越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代。在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解放斗争中，他始终与人民并肩携手，勇往直前。正是在革命斗争的风云中，陶行知先生的思想得到巨大的发展，成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。他丰富的教育实践和论著，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丰硕成果，是值得我们珍视和继承的宝贵遗产。本文试就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，谈几点看法，请同志们批评指正。

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活动是从一九一六年学成归国，担任南京高等师范教职时开始的，迄至一九四六年逝世，共约三十年。由于他对祖国、对人民、对民族的热爱，早在留美期间和归国初期，就表现了他作为人民教育家的优点和特色。他一踏上教育岗位，就显示出赤子的忠诚，战士的激情和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。这种宝贵的品质，使他跨出的第一步就十分坚实，他在给陶文濂的一封信中说：“我本是一个中国的平民，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把我向国外的贵族的方向转移。学校生活对于我的修养，固有不可磨灭的益处，但是这种外国的贵族的风尚却有很大的缺点。好在我的中国人性、平民性是很丰富的，我的同事们都说我是一个‘最中国的’留学生，经过一番觉悟，我就象黄河决了堤，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。”“中国的平民的路”，就是陶行知先生一生所走过的道路。而中国性、平民性，也正是他早期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。主要表现为对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文化的深恶痛绝；鄙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优越感，毅然抛弃为一般留学生所梦寐以求的大学教授职位，参加平民教育运动，戴着科学博士桂冠却心甘情愿编写《平民千字课》。这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间是难能可贵的。这种自觉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精神，值得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学习和发扬。

不过，陶行知先生早期的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思想，带有朴素的性质。

大家知道，在阶级社会里，教育是有阶级性的，每一个教育家都不可避免地要过向政治。有的教育家以不问政治为清高，那不是出于政治上的欺骗，就是由于政治上的天真。有的同志说，陶行知先生一开始就把教育与政治联系在一起。我们则认为，陶行知先生对这个原则问题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。

陶行知先生的青少年时期，曾经受到宋明理学的影响；留美期间，师承杜威，甚得这位资产阶级教育家的赏识，受过“欧风美雨”的熏陶。因此，在他从事教育活动的初期，政治思想上的自由主义倾向，教育思想上的实用主义影响，都是显而易见的。批评他曾经是个“教

育万能论”者、“教育救国论”者,自然未必恰当。如果说他对教育的社会功能缺乏本质上的认识,一度过分夸大教育的社会作用,庶几是中肯的。他回国之初,面对百孔千疮的城市,凋蔽萧条的农村,以为只要兴办学校,运用教育的力量,就可改变一切。他立下宏愿:“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,征集一百万位同志,提倡一百万所学校,改造一百万个乡村,使中国乡村一个个都变成‘天堂’,都变成‘乐园’。”这里的“中国性”“平民性”表现得很清楚,改良主义思想也表现得很清楚。陶行知先生回国不久,参加了学制改革运动、收回教育权运动、职工教育运动、平民教育运动,都未能与当时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;他主持的“中华教育改进社”,只是以“调查教育实况,研究教育学术,为谋教育之改进为宗旨”,做的工作,主要也是选派社员出国考察,邀请专家来演讲,等等。再就平民教育运动的目的来看,也仅仅“在使全国四万万人中凡不识文字及缺乏知识之国民,普遍的得到补充教育之机会。”由此可见,当时的陶行知先生对旧中国社会上的种种不合理、不平等现象,尚无本质的认识。他只看到祖国贫穷落后,人民灾难深重,没有看到其根源;看到了平民、农民没有文化,看不到人民没有政治权利。总之,陶行知先生尚未认识到旧中国的教育,是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基础之上的,是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统治劳动人民的工具,是为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服务的。这就是传统教育、洋化教育的本质。要改造这种教育,就必须先有一个政治上的革命;要为人民大众争教育权,先得为人民大众争政权;要使人民大众成为教育、文化的真正主人,先得使他们在政治上当家作主。因此,我们认为,陶行知先生推行平民教育,提倡乡村教育、普及教育,打破了只有全日制学校教育才算教育的传统教育观念,使许多能够学习、愿意学习的人,不受地区、年龄、职业、家庭和经济条件的限制,都得到受教育的机会,把教育扩大到大众、社会,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个了不起的创举,在冲击传统教育、洋化教育强加于劳动人民的种种枷锁上有着巨大的意义;他满怀为人民服务的热情,抛弃高官厚禄、荣华富贵的招引,脱下西装革履,换上短衫草鞋,到农村去,到农民中去,誓为农民“烧心香”,谋幸福,这种思想是崇高可贵的。但由于对教育的本质,教育与政治的关系认识不很明确。因此,在教育怎样为人民谋利益问题上,带上改良主义的色彩。当然,这只是人民教育家在前进道路上的一个发展过程。

可贵的是,陶行知先生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,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坚定的。他始终以人民的利益作为真理的最高标准,作为自己一切思想、行动的最高准则。正是这种与人民同呼吸,共祸福的精神,使他在前进的道路上不断地摸索,执着地追求,“去找路线,寻方法,造工具”,以实现自己的理想,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。经过初期的曲折,到了晓庄学校被封的时候,蒋介石用屠刀把血淋淋的政治放到他面前。阶级斗争的事实教育了他,共产党人的鲜血照亮了他的眼睛,使他看清楚了:反动统治者是不容许任何人为人民做好事的,那怕是教育上的一点改良也罢。从那时起,陶行知先生逐步明确了教育离不开政治,特别是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民族危机日益加深,更使他不能不问政治了。于是他逐步地把“生活教育”运动与民族、民主斗争结合起来,“国难教育”、“抗战教育”、“全面教育”、“民主教育”的相继提出,表明陶行知先生已日趋自觉地将教育与政治联系在一起,成为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的一翼。他在“一二·九”运动之后不久写的《民族解大学》一文中说:“这个大学没有围墙,万里长城还嫌太短,勉强的说,现在中华民国的国界就算是我们这个大学的‘四至’。”“学校虽大,功课只有一门,这门功课叫‘民族解放教学做’。简单一点,它叫做‘救国教学做’。先生教什么?教救国。学生学什么?学救国。”特别值得指出的是,陶行知

先生在这篇文章里，已经旗帜鲜明地批判了“教育救国论”，他说：“最近教育部通告里说‘教育之生命即民族之生命’这句话也要颠倒过来，才是真理。民族之生命即教育之生命，不救民族之生命，那能救教育之生命！这个大学校只救民族之生命，则教育自然有生命了。”他所拟订的“国难教育”目标规定：推进大众文化；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；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与主权之完整。并且亲自担任国民外交使节，出国宣传反侵略；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他把“国难教育”推进为“抗战教育运动”；人民解放战争时期，他反对国民党法西斯专政，坚决提倡“民主教育运动”，他说：“民主教育，是教人民做主人，做自己的主人，做国家的主人，做世界的主人。”最后，陶行知先生不仅作为教育家，而且作为英勇的清醒的民主战士，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，献出了整个生命。

这里，我们想补充一点：有的同志认为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成熟于晓庄时期。我们觉得根据上面所说的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来看，把成熟期定为“国难教育”时期比较妥当。因为在此前，陶行知先生的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思想尚带有朴素的性质，也正是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，他的教育思想才逐渐完成了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转变。

× × × ×

教育作为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，它的社会功能是通过人的培养来实现的。在阶级社会里，一定的阶级对自己所需要的人，都有一定要求。从属于一定阶级的教育家，都是根据自己阶级的要求，按照自己阶级的面貌来培养人的。因此，培养什么人的问题，在古今中外教育家的理论和实践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
陶行知先生的老师杜威博士主张教育无目的论。杜威以前和同时代的一些资产阶级教育家，在教育目的问题上，也都“怀抱琵琶半遮面”，羞羞答答，吞吞吐吐。他们有的主张培养“真善美的人”，有的说教育目的在于培养“纯粹的人”，也有人提出要培养什么“有理性的人”、“和谐的人”等等，不一而足。“无目的论”也好，培养这样那样的人也好，都是自欺欺人之谈。在阶级社会中，超阶级的人性、“纯粹的人”，是不存在的；所谓“理性”、“和谐”、“真善美”之类，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和阶级的内容。资产阶级教育家心目中的“真善美”的人，实际上就是按照资产阶级的要求、面貌塑造的“完人”。所有这些论调，无非是为了掩盖资产阶级教育目的论的实质罢了。在我国封建社会里，国学、太学、府学、州学、县学等各级学校，都以孔孟之道为准绳，培养“忠君”的“为政”之士。孔子说：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新民，在止于‘至善’”。这个“至善”，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道德标准，就是奴隶主、地主阶级的精神面貌。旧中国的传统教育，虽经戊戌变法期间的一些改革，“五四”运动前后提倡科学民主，反对尊孔读经，使封建主义教育思想受到一定冲击。但是，教育制度、教育内容、教育方法上，半封建、半殖民地教育性质没有改变。这样的教育，仍然是剥削阶级的专利，为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服务，根据他们的目的进行人的培养。培养出来的人，不是“读死书、死读书、读书死”的书呆子，就是反动统治的爪牙，帝国主义的买办奴才。极少数例外的人，也只能在旧中国的瓦砾场上苦闷彷徨，无所作为。至于劳动人民，与其说是受教育，还不如说是被奴化。

那么，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目的论是什么呢？他要培养怎样的人呢？在《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》一文中，陶行知先生说：“教师的职务，是‘千教万教，教人求真’。学生的职务，是‘千学万学，学做真人’。”什么叫“真人”？陶行知先生没有作专门阐述。但从他的有关论述中不难了解，“真人”就是“说真话做真事的人”。什么是真事呢？陶行知先生说，就是

教育是与社会生活一起产生，一起存在，一起发展的。人们有了生活，也就有教育，教育按照人们生活的需要自然而然地进行着。在远古时代的原始社会里，没有学校，却有教育。传说中的神农氏教民播种五谷，有巢氏教人筑巢为居，嫫祖教人缫丝而织，不正是那时候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教育吗？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发展变化，都给教育带来新的任务和内容，随着阶级的产生，人们的社会生活除了生产斗争之外，还有了阶级斗争。有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，就有反剥削反压迫。于是，生活中除了生产知识的传授教育，也必然存在阶级斗争教育。教育存在生活之中，是由生活决定，随着生活的发展而发暖，又反过来推动生活发展。“生活教育”就是生活所原有的教育，在社会上出现了学校教育以后，生活教育依然存在。统治阶级垄断学校教育，可以剥夺劳动人民受学校教育的权利，但无法剥夺他们在生活中、生产中进行教育的机会。陶行知先生说：“自有人类以来，社会即是学校，生活即是教育。士大夫之所以不承认他，是因为他们有特殊的学校给他们的子弟受特殊的教育，从大众的立场上看，社会是大众唯一的学校，生活是大众唯一的教育。”生活教育的实际存在，是陶行知先生提出“生活教育”的客观根据。所以，我们可以认为，陶行知先生倡导的“生活教育”，并不是他个人头脑的产物，不是凭空掉下来的，而是他向社会向群众学习的一个创造。陶行知先生说过：“我的生活教育的思想，大半都是从……老百姓中的启发而来的。”

“生活教育”是来自实际生活的一种创造，同时也是符合旧中国的国情的一个创举。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，中国的教育家们看不到中国教育的不发达和不平衡，看不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，办教育具有自己的特殊规律，未能从这种实际情况出发去探索自己办教育的途径和方法，而是沿用过时的旧经验和机械地仿效他国。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：“我国兴学以来，最初仿效泰西，继而学日本，民国四年取法德国，近年特生美国热，都非健全的趋势，学来学去总是三不象。”其结果，教育陷入山穷水尽的困境，处于半死不活状态。陶行知先生为着改革中国教育，对教育的实际状况作了大量的调查，由乡村到城市，从小学到大学，研究过许多典型材料，从生活中找到了适合中国实际的教育形式和实施办法。他写的《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》、《中国普及教育方案商讨》，就是很好的教育调查报告。在地大人多贫穷落后的中国，如果没有适合国情的办法，普及教育只能是空谈。陶行知先生说：“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农业国，大家靠着一双手和锄头斧头生产，所以生活是穷苦得很”，“我们要在穷社会里找出穷办法来，使一切穷人都得到教育”。

“生活教育”来自生活，植根于生活，为生活所必需，又随着生活的发展而发展。这里，我们想着重指出，“生活教育”在它每一个发展阶段上的新课题，都是由社会实践、人民斗争的需要提出来的。正是实践不断提出的新要求、新问题，推动陶行知先生进行新的探索，取得新的认识，使“生活教育”得以不断发展，不断提高。

× × × ×

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经验十分丰富，虽然时隔半个世纪，跨越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一个历史阶段，但仍然值得我们好好学习。我们觉得他那种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，敢于创造的革命精神，特别值得我们认真发扬。陶行知先生对于我国的历史遗产，对于他国的教育学说，既不是一概排斥，也不是全盘照搬，而总是从当时社会的实际出发，有分析有批判地吸收其某些合理的成分，为发展我国自己的教育服务。我们对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，也应该用历史观点进行深入的研究，吸取其合于科学的成分，以创造中国式的现代化教育科学，使之成为发展社会主义教育服务。